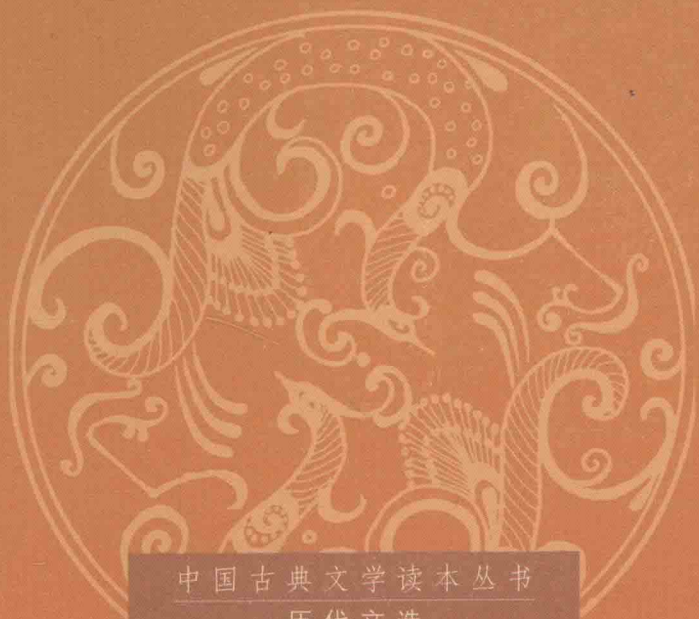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历代文选

汉魏六朝文选

刘文忠 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历代文选



汉魏六朝文选

刘文忠 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魏六朝文选/刘文忠选注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0

(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7676-5

I. 汉… II. 刘… III. 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-汉代~
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I 2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4866 号

责任编辑:葛云波

责任校对:葛云波

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69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21.75 插页 1

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7676-5 定价:3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从公元前 206 年西汉王朝建立,到公元 581 年隋文帝统一中国,历时近八百年,史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,历史上也有人称这一时期为汉魏六朝。这一时期的文学在继承先秦文学发展的基础上,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局面,出现了许多新文体、新思路、新风貌,特别是诗文,获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。应当承认这一时期的文学是空前繁荣的,其成就也是辉煌的。也正因为如此,汉唐文化才能成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。文学的其他方面的发展与成就我们姑且不论,现在仅就汉魏六朝文的发展与成就略抒己见。

汉代的文引人注意的有四个板块,一是西汉初以贾谊、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文,本书选注了贾谊的《过秦论》和晁错的《论贵粟疏》作为代表。这一类文章的出现自有它的时代背景的: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之后,为了求得王朝的长治久安,开始注意总结历史上王朝兴败盛衰的原因,特别是秦朝速亡的原因,更是他的前车之鉴,《过秦论》、《论治安策》等,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。同时,汉初的经济在经过了秦末的社会大动乱之后,本来就不太发达的生产力,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当时的社会还潜伏着许多的矛盾和危机,这种状况直到汉文帝时代,还不见太大的转机,所以贾谊在《陈政事疏》说:

臣窃惟事势,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,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,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天

下已安己治矣，臣独以为未也。曰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，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燃，因谓之安，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！

贾谊是没有胆量在皇帝面前危言耸听的，他不过是敢于正视现实又敢于讲真话罢了。晁错也与贾谊有点相似，他也是个敢讲真话的人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他极力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，为此他付出了血的代价。他的《论贵粟疏》也能洞察当务之急，所言都颇中肯綮。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说贾谊、晁错的文章“疏直激切”，其评价是中肯的。

汉文的第二个板块是汉赋，它是整个汉代最主要的文体，是纯文学作品，也是汉代发展演变最为迅速的文体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篇说赋是“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”。说它“受命与诗人”，其着眼点是《诗大序》有“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”的“六义”之说，赋的得名即从“六义”之中位居其二的“赋”而来。“六义”中的赋，不过是一种表现手法，并不是一种文体。从汉赋开始，变成了一种文体，而这种文体的特点便是“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”（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）。所谓“拓宇于楚辞”，就是说汉赋是从《楚辞》的领域开拓发展而来。从赋的发展史而言，楚辞是骚赋的时代，骚赋的写作一直延续到汉初，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就收有汉人的作品。西汉人的骚赋在体式上与《楚辞》是十分相似的，如我们所选的贾谊的《鹏鸟赋》与《吊屈原赋》，在句式上还保留着《楚辞》的“兮”字，把它们视为骚赋也并没有什么不妥。可是枚乘的《七发》就与贾谊的赋有所不同了，不仅没有了“兮”字，在描写上铺张扬厉之风也开始形成，赋中也有了主客的对话，他虽然没有以赋名篇，实际上在体式上已接近大赋，可视为骚赋向大赋（辞赋）的过渡。萧统的《文选》没有把《七发》放在赋类里，而是单设了一类“七”体，我想萧统所以这样

做,可能有两个考虑。一是《七发》的体式确实与赋有所不同,《七发》虽有吴客和楚太子的对话,但并没有主客之间或客与客之间的互相辩难。在《七发》中楚太子没有说几句话,吴客却连用七事来循循善诱地启发太子,可以说《七发》就是启发,就是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,最后以太子据几而起曰:“听圣人辩士之言,泅然汗出,霍然病已”作结,这与汉代大赋以“卒章显其志”、“曲终奏雅”的方式最后来一点讽谏又有所不同。从严格的意义上说,《七发》还不能算赋,此其一。其二是,枚乘《七发》问世之后,仿效者颇多,逐渐形成了一种体式,这就是《七》体。曹植在其所写的《七启·序》中说:

昔枚乘作《七发》,傅毅作《七激》,张衡作《七辩》,崔駰作《七依》,辞各美丽,余有慕之焉。遂作《七启》。并命王粲作焉。

这说明在曹植的时代,《七》体已初具规模。《文选》把它列为一类,也自有它的道理。另外《七发》还不能说是“拓宇于楚辞”的,它的体式与风格与楚辞没有多少相似之处,倒是与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的言谈风格有些相似,所以楚太子把吴客之所言,视为“圣人辩士之言”。但《七发》在赋的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,它是向赋过渡的桥梁。

汉代的大赋的模式是司马相如奠定的,我们所选注的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,实则是《天子游猎赋》一篇大赋的两个组成部分。此赋在艺术描写上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,赋中又虚构了三个人物:子虚、乌有、亡是公,有主有客,有互相之间的对话,也有互相之间的辩难。楚国使者子虚先生在看到齐王举行的盛大的游猎活动之后,在齐国的乌有先生与天子使者亡是公面前大夸楚国的园囿之大、游猎之盛、物产之富,以期压倒齐国。乌有先生加以辩难。最后天子的使者亡是公出来,盛夸天子的

上林苑之大、车骑游猎之壮观，皆非齐楚可比。又通过亡是公之口，说出天子已觉察到这样做未免太奢侈了，“于是乎乃解酒罢猎，而命有司，曰：‘地（指上林苑）可垦辟，悉为农郊，以赡萌隶。隄墙填堑，使山泽之人得至焉。……发仓廩以救贫穷，补不足，恤鰥寡，存孤独。出德号，省刑罚，改制度，易服色，革正朔，与天下为更始。’”这就是“其卒章归之于节俭。因以风谏”。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大赋的“体物写志”也于此可见。

自司马相如奠定了汉赋的模式之后，两汉的大赋模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汉代赋的发展并没有凝固化，而是处在迅速的变化之中，这不仅表现在题材的开拓上，也表现在体式的发展变化上。

《文选》六十卷，从卷一到卷十九都是选的赋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。它把赋又分为十五类，这是从题材内容上分类的。有些分类在今天看来也并不完全科学，但也初步体现出汉赋内容的丰富性，特别是京都与畋猎的大赋，闳丽巨衍，雍容典雅，它是汉代国力富强的表现，是汉代文人润色鸿业的力作，也是当时的时代产物。要正确而全面的评价汉赋，不能不看到这些方面。

对于汉赋如何评价，在汉代就有所争论，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赋已略露微词，他指出相如曾向汉武帝献《大人赋》，本意是讽刺汉武帝好神仙之术的，汉武帝看了之后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意，可见赋的讽刺效果是很不理想的。司马迁又说：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。”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）既批评了司马相如赋的“虚辞滥说”又肯定了它的讽谏作用，其评价还算公允。而扬雄对汉赋的批评，比司马迁更为激烈。他在《法言·吾子》篇中，把赋看作是“童子雕虫篆刻”的玩意，是“壮夫不为”的。他本身就是赋家，却对赋

如此的轻视,令人难以理解。当谈到赋的讽刺作用时,他认为赋的讽刺作用是劝百讽一的:“讽则已,不已,吾恐不免于劝也。”汉代的文论家比较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,对文学的审美作用则不太重视,所以批评汉赋的虚辞滥说、雕虫篆刻还是可以理解的,有它合理的因素。司马相如奠定的汉赋模式,自有它自己的局限,所以在东汉后期,出现了张衡的《归田赋》、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赋》、王粲的《登楼赋》等抒情小赋,它们汰除了铺张扬厉之风,以及堆垛寡变、板滞凝重之弊,用清新俊永、短小精悍的抒情小赋,取代了闳丽巨衍的大赋,也增强了赋的抒情性,是赋史上的一次变迁。

两汉文的第三个板块是以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为代表的历史纪传文,因限于篇幅,本书没有选录。鲁迅先生称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。其思想与艺术成就均在班固的《汉书》之上,在汉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两汉文的第四个板块是应用文,应用文的范围很广,章、表、书、记、碑、诔等都包括在内。汉代的应用文起点很高,它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,像司马迁的《报任少卿书》,可以说是用血泪写成的,今天读来,仍然令人回肠荡气,叹为观止。

汉代写碑文的以蔡邕最为有名,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诔碑》篇云:“自后汉以来,碑碣云起,才锋所断,莫高蔡邕。”我们只选了蔡邕的《郭有道碑文》一篇。东汉的“谀墓”之风颇为盛行,有钱的人家只要肯出高价,便可以对碑主大加美化,以至出现“生为盗跖,死为夷齐”的现象。蔡邕曾对人说:“吾为碑铭多矣,皆有惭德,唯《郭有道》无愧色耳。”(《后汉书·郭太传》)可见这篇碑文是比较真实的。

建安时代孔融和陈琳的应用文成就也是比较高的。孔融有两篇举荐人物的文章,一是《论盛孝章书》,一是《荐祢衡表》,两

篇文章都是写给曹操的,这说明他曾经对曹操抱有很大的希望。他的书信和章表曾受到李充《翰林论》和刘勰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篇的称赞。我们只选了《论盛孝章书》一篇。陈琳的《为袁绍檄豫州》是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,它以先声夺人之势,历数了曹操的种种罪状,并连及曹操的父祖,申明讨曹的目的是防止曹操篡权,以匡扶汉室。并号召各州郡起兵响应,在非常之时,建非常之功。文笔酣畅,气势若江河奔泻,是檄文中的优秀之作,对唐代骆宾王的《讨武曌檄》有明显的影响。

汉文的成就是相当高的,从唐宋的古文运动所宗法的文统来看,两汉文是它们的主要宗法对象。

韩愈学古文是从三代而至两汉,苏轼是“将以追两汉之余,而渐复三代之故。”他们二人同样在提倡古文,韩愈主张由三代而下至两汉,苏轼则主张先追两汉,再逐渐地复三代之古,认为学习两汉文更是当务之急。到了明代的“前后七子”便提倡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了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两汉文是古文发展的一个高峰,也是古文的始盛期。

东汉末的建安(196—220)时期,是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期,也是“文学自觉”的开始,所谓“自觉”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,就是在文学中发现自我、表现自我,这又与思想解放相联系。这种新的风气也自然会影响到文的创作,文的抒情性加强了,对文的艺术形式美也更加讲究,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“诗赋欲丽”,正是对文学作品提出的新的审美要求的表现。曹氏父子与“建安七子”的文章,文字都渐趋省净、清丽,在赋的领域,这种变化表现的更为明显,我们姑且以祢衡的《鹦鹉赋》和王粲的《登楼赋》为例,来看一看他们的赋有什么新的特点。

《鹦鹉赋》是咏物之作,但它意不在物,而是一篇托物言志

之作。赋中所写的“挺自然之奇质”、“体金精之妙质”、“性辩慧而能言”、“才聪明而识机”，以及“容止闲暇，守植安停，逼之不惧，抚之不惊”等等，其咏物都带有象喻性，是其恃才傲物的性格写照。后文所写的“流飘万里，崎岖重阻”，“嗟禄命之衰薄，奚遭时之险衅”，更是他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、为一个个统治者所不容而流徙播迁的写照，此赋可谓名为咏物实为咏怀。写鸟又写人，处处不离所写之物而又不粘于物，咏物与抒情融化无迹，辞采华丽而又朴茂清新，是难得之佳作。

《登楼赋》所抒写的，一为远适荆蛮的思乡之情，一为怀才不遇之叹。以他自己的身世遭遇而言，很有个性化的特点。它又采用了骚赋的形式，除了“兮”字之外，均为整齐的六字句，句式十分整齐，辞采明快华茂，音韵自然婉谐，全赋数次换韵，皆转换自如。在抒情手法上，采用了多种手法的交替，克服了大赋的平板，而显得富有波澜，体现了追求丽的倾向。它与骚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，而与大赋迥然有别。司马相如所奠定的大赋模式是散体，是将骚赋散文化，而汉末与曹魏时代的赋走的是抒情化与诗化的道路，是向骚赋的回归，但又不完全像骚赋。看来文学的发展也是沿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前进的。

建安至魏初抒情赋的代表作家是曹植，从现存资料看，他大约写了四十篇左右的赋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赋苑中的奇葩《洛神赋》。作者以神奇的色彩，举体华美的文笔，绚丽的辞藻，丰富的想象，缠绵悱恻的感情，为读者塑造了一位光彩夺目的美神。此赋的写作时间比《登楼赋》晚十七年，在这十七年中曹植又将抒情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它明显地受到宋玉《神女赋》的影响，而不是汉代大赋的路子。它虽然使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，但这种问答既有别于宋玉的《高唐赋》与《神女赋》，也不同于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。《神女赋》反复使用对话，

《子虚赋》等的对话带有辩难性质,而《洛神赋》的对话只是起了引起下文的作用,要而不繁,干净利落。从句式上看,《洛神赋》从三字句到十字句不等,长短句交错使用,纡徐委曲,错落有致。

曹植把赋变成美文,而且有诗化的倾向。

曹植的应用文写得也很美,我们所选的《求自试表》、《与杨德祖书》是其应用文的代表作。《求自试表》中已有些有意结撰的对偶句,为日后骈文的出现,奠定了初步的基础。

三国时代的文,蜀汉的文章,我们只选了脍炙人口的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曹魏的作家我们选了阮籍、嵇康和向秀的几篇文章。他们都是“竹林七贤”中的人物。曹魏时代是玄学盛行的时代,文章大受玄风的影响,玄学的思维是思辨性的,互相之间往往有所辩难,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,产生了一批论文。阮籍的《通易论》、《通老论》、《达庄论》、《乐论》等,都是玄学方面的论文,《大人先生传》也写得颇为精彩,这五篇文章因篇幅较长,我们没有选录,仅选了一篇奏记《诣蒋公》和一篇《猕猴赋》。阮籍在文中虽然没有说清楚不愿应太尉蒋济征召的原因,在天下多故的时代,为了远祸自全,他不愿裹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去,只好言不由衷得敷衍几句,所以文章特短。阮籍是崇尚自然而反对名教的,对于虚伪的礼法之士他深恶痛绝,《猕猴赋》可视为讽刺礼法之士的小品。他以老、庄的崇尚自然本性的哲学观点,否认统治阶级历来宣传的禹铸九鼎“异物来臻”的祥瑞,又用猕猴来象喻追求功名利禄的礼法之士,把他们形容为人面兽心之徒,虚伪而善于表演,虽处縲绁,尚且作态媚人,一心希冀受到主人的嘉惠,终不免成为主人的玩物,最后落了个“伏死于堂下,灭没乎形神”的可悲下场。此赋构思奇特,描写微妙微肖,语言也生动活泼。

嵇康的文,我们选了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和《琴赋》两篇,这

两篇文章都很有特色。嵇康是精通音乐的人,《琴赋》与《声无哀乐论》是他描写音乐、表现音乐美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章。《琴赋》的同题之作不少,东汉的傅毅、马融、蔡邕都写过《琴赋》,而《文选》独选嵇作,是有眼光的。此赋从琴的材质、制作、演奏、琴德等诸多方面,加以铺张、渲染。从弹琴与听琴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音乐美学思想,洋洋洒洒,仪态万方。其中的音乐描写,不仅使用了大量的形象比喻,而且涉及到以视觉写听觉的“通感”问题,对后代的音乐描写影响很大。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是一篇刚肠疾恶而又带有几分偏狭的个性色彩的书信,书中所写的“七不堪”、“二不可”,是与官场决裂的宣言,也是嵇康人格的自我表白,可从一个侧面看到魏晋名士的风度和心态。颇有认识价值。

魏代的后期,大权已经落到司马氏手中,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的政权,大力排斥异己,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,当时名士少有全者。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嵇康与吕安,就死在他的刀下。我们所选的向秀的《思旧赋》,就是为纪念嵇、吕两位亡友而作。鲁迅先生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中说:“年青时读向子期《思旧赋》,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,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。”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,有话不敢直说,所以便形成了文尚曲隐的现象。

晋代历史上分为西晋和东晋两个历史阶段。西晋的文和赋,与前代相比,在体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,只不过在语言上更追求藻饰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篇说:“晋世群才,稍入轻绮,采缛于正始,而力柔于建安。”这虽然是针对诗歌的发展而言,但也部分地适用于文的情况。这一时期的文,语言渐趋骈偶化。就文而言,是由散体的文在逐渐向骈体文过渡;就赋而言,处于由辞赋向骈赋的过渡时期。西晋的文,我们选了李密的《陈情事表》、张华的《鹪鹩赋》、左思的《三都赋》与《白发赋》、

潘岳的《秋兴赋》与《闲居赋》、陆机的《叹逝赋》等,以上这些作品除《白发赋》外都见于《文选》。同时我们也选录了四五篇《文选》所不曾注意的作品,如刘琨的《壶关上表》、《与石勒书》、《答卢谌书》和鲁褒的《钱神论》等,以增加应用文和其他文体的篇数。李密的《陈情事表》由于《文选》和《古文观止》都选了它,故最为脍炙人口,表现作者与其祖母相依为命的亲情,尤为感人肺腑。张华的《鹪鹩赋》是托物言志之作,与祢衡《鹦鹉赋》的手法是一脉相承的。左思的《三都赋》问世之后,一时争相传写,有洛阳纸贵之说。这篇写京都的大赋,走的还是汉代大赋的路子。汉代大赋描写京都题材的有四五篇之多,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,张衡的《西京赋》、《东京赋》、《南都赋》等,均为《文选》所选录,而且所选作品的数量,在赋的十五种分类中居于首位。而这种题材的赋由汉至晋经久不衰,仍有人在蹈袭前人之路在仿效摹写。左思在完成《齐都赋》的创作之后便开始准备,从资料的收集、构思到写成,他大约用了十余年的时间,是他的力作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篇云:“左思奇才,业深覃思,尽锐于《三都》,拔萃于《咏史》。”就是把《三都赋》作为左思文的代表作的。另一篇《白发赋》是用拟人化的手法,托白发与作者的对话而写成的寓言小赋,这篇赋可能作于晚年,他把一生未得志的牢骚诉之于诙谐而幽默的对话之中,显得姿趣横生,新颖别致。潘岳的两篇赋,不管是写景还是抒情,都能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,辞藻绚丽明净,行文自然流畅,自有一种清丽的风韵。

刘琨的文大多写于后期,即永嘉元年(307)任并州刺史之后,我们所选的三篇应用文,都很有特色。西晋后期,内乱外患交相发生,历时十余年的“八王之乱”,使中原大地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,这时居于我国北部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们,也乘虚而入,西晋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,刘琨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任

并州刺史而走上抗敌前线的。在上任的途中,他所看到的现实是“目睹困乏,流移四散,十不存二,携老扶弱,不绝于路。及其在州者,鬻卖妻子,生相捐弃,死亡委危,白骨横野,哀哭之声,感伤和气。群胡数万,周匝四山,动足遇掠,开目睹寇。”(《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》)其描写当时的现实是非常真实可信的。在西晋末,刘琨官至大将军、司空、都督并、冀、幽三州诸军事,是当时的北方重镇。为了匡复晋室,靖乱中原,他在抗敌前线做了许多工作。他的《与石勒书》是为分化瓦解敌人劝石勒降晋的,《书》中对石勒晓之以大义,说之以利害,文字简净,结构顿挫起伏,文笔清丽,一气贯注,在晋文中是不可多得的。《答卢谡书》是刘琨遇害前的作品,《书》中除了抒写与卢谡分别的怅恨与勉励卢谡之外,还说到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,在国家危机之秋,在现实的教育与感召激励下,促使刘琨从老、庄思想中觉醒过来。从魏晋名士追求的放纵、旷达中解脱出来,他说:“昔在少壮,未曾检括,远慕老庄之齐物,近嘉阮生之放旷。怪厚薄何从而生,哀乐何由而至。自顷辘张,困于逆乱,国破家亡,亲友凋残。负杖行吟,则百忧俱至;块然独坐。则哀愤两集。……然后知聃、周之为虚诞,嗣宗之为妄作也。”这就是刘琨觉醒后的自述。此文颇有认识价值。文章言简意赅,骈散结合,可见晋文渐趋骈偶的发展趋向。

鲁褒的《钱神论》是过去不曾注意的一篇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文章,它用冷嘲热讽的语言,淋漓尽致地揭露出钱能通神的现象。作者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是与黑暗腐朽的西晋社会联系在一起的,这比沙氏比亚在戏剧中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要早一千多年。作者把孔圣人所说的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改为“生死无命,富贵在钱”,这是非常大胆的,既批判了儒家的“天命论”,又对金钱的经济杠杆作用,作了充分的估计,其经济

思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作者对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,并未否定,所否定的是统治阶级对金钱的贪婪与无限的追求。此文很富有幽默感,把铜钱称为“孔方兄”是从此文开始的。

东晋士族文人重玄谈的风气与西晋大体相似,此时佛教的流行,又更盛于西晋。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,一代代的皇帝大多不思振拔,不图恢复,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。这一时期的文学,在文和赋的领域,渐多模山范水之作。郭璞的《江赋》、孙绰的《游天台山赋》可作这一方面的代表。表现祖国的山水之美,为文艺园地增添新的花朵,本来是一件好事,遗憾的是他们对广阔的社会现实反映得太少,已少有像刘琨那样的作家了。东晋的文值得称道的是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和陶渊明的几篇文章。《兰亭集序》融记叙、议论、抒情于一体,语言朴素自然,对后代散文影响颇大。序中还写到作者自己的人生觉醒,他经过人生的反思,认识到“一死生为虚诞,齐彭殤为妄作”。对庄子的“齐物论”提出批判,在老庄哲学与玄学风行的时代,作者有此认识是难能可贵的。这是刘琨之后的又一个觉醒者。

东晋的文以陶渊明的成就为最高,这与他的“质性自然”与恬淡的心境有关。《归去来兮辞》是其代表作。这是一篇陶渊明与官场决裂的宣言书,他率真地向读者打开了他的心扉,他把对官场的认识,对人生真谛的思索,对做官与弃官归田的原因,对前半生人生道路的反思与觉醒等等,都和盘托出。他的心态,他的精神境界,均在一篇《归去来兮辞》中得到充分的表现。它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,语言清丽、简净,自然而又有韵味,千百年来赢得许多人的称赞。欧阳修说:“晋无文章,唯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而已。”这话说得虽然有点绝对,但这篇文章确实是晋文中的佼佼者。《桃花源记》是一篇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优美散文,桃花源是作者理想中的天国,是没有压迫、没有剥削、没有尔

虞我诈,民风淳朴的一片净土,它与污浊的官场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是对立的,而且有深厚的思想渊源。它在艺术构思上颇为巧妙,奇中求真,引人入胜。且笔法疏淡,语言简约,在时代文风渐趋骈偶的东晋,陶渊明独能拔出流俗,采用纯粹的散文体来写作。他的《五柳先生传》其语言风格也大体如此。而其《闲情赋》确是别具一格的文章,赋中描写了一位令人日夜悬想的绝色佳人,作者幻想日夜与她相处,形影不离,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,附着在这位美人身上。这完全是人们心目中的另一个陶渊明,其主题思想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,为了避免穿凿附会,我们比较倾向于爱情说。

南朝宋的文向骈体的发展又进了一步,刘勰说:“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老庄告退,而山水方滋。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,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:此近世之所竞也。”(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这虽然是针对诗歌而说的,也基本上适用于文,这时山水题材的文多了起来。我们所选的谢惠连的《雪赋》和谢庄的《月赋》,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《雪赋》用赋的传统的主客对话的形式,假托西汉的梁孝王在兔园赏雪,召来了枚乘,邹阳、司马相如三人一起咏雪,主客各借典故,刻画雪景。司马相如的一大段咏雪是赋的主体,写雪景之美,瑰丽奇绝,极尽化工之妙。赋中又有枚乘的“积雪之歌”和“白雪之歌”,添加了携佳人饮酒赏雪的艺术描写,增强了赋的抒情成分。枚乘的乱曰,由赋景、抒情而转向议论,赞美了雪的品格,将雪人格化。雪的随物赋形、从风飘零、遇热而融、遇染而变、无虑无营的特点,正是老庄随遇而安、委运任化、恬淡自然思想的反映。这种结尾与当时山水诗的玄言尾巴有点相似。《月赋》也采用了“假主客以为辞”的传统赋法,用曹植等四位文学家作为赋中人物,“先叙事,次咏景,次咏题,而终之以歌,从首至尾,全用《雪赋》之

格。”(祝尧《古赋辨体》卷六)比起《雪赋》来,《月赋》的议论和玄言尾巴都不见了,它写月之美,运用的是烘云托月之法,重在借月色抒情,抒写出在深秋季节的寂寞月夜中,人们对月的感受。赋末的歌“美人迈兮音尘阙,隔千里兮共明月”云云,又着上一层月夜怀人的凄楚气氛。从《雪赋》到《月赋》,我们可以看出宋初赋的一些演进之迹。《雪赋》和《月赋》在形式上已基本上可说是骈赋了。骈赋也称俳赋、“四六赋”,它是汉赋(辞赋)的变体,在体式上的特点是重对偶,句式多为四字句和六字句,四六交错使用而形成对偶,这就是所谓的“骈四俪六”。在用辞上讲究辞藻绮丽,同时也讲究声韵的婉谐。读之声韵铿锵,朗朗上口。其后鲍照《芜城赋》的出现,标志着骈赋的发展已臻于成熟的境地。

《芜城赋》在体式上与《雪赋》、《月赋》不同的一点是“假主客以为辞”的汉赋模式完全脱尽,既无人物也无对话,纯粹是抒情主人公的语言,句式也更加整齐,可视为骈赋的代表作。此赋将广陵昔日的繁盛与今日的萧条进行对照描写,写今与昔都使用了艺术的夸张,写昔日之盛正是为了突出今日之衰,读之让人惊心动魄。它在语言的提炼上,于浓郁之中见奇峭,骈俪之中有转折、错落、变化,所以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赞。

鲍照在宋代是位文学创作成就很高的作家,因出身寒门,受世族门阀的压制,在仕途上很不得志。“才秀人微”的鲍照在政治上是有远大抱负的人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郁积在他的胸中,遇之即发,这在我们所选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和《瓜步山楬文》中都有所表现。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通篇都是写景,在前此的书信中是不曾看到的,流露出借山水写怀抱的倾向。“窥地门之绝景,望天际之孤云,长图大念,隐心者久矣。南则积山万状,负气争高,含霞饮景,参差代雄。”那隐心已久的“长图大念”与“负气